

“民间大使”卜汝亮，著名印华双语作家



(著名双语作家卜汝亮)

巴厘：意如香

穷而有志思创举，学不自满求创新。

卜汝亮——被已故印华资深作者陈正祥老前辈誉为“民间大使”，实至名归，名副其实。他是著名的资深印华文坛双语作家。卜汝亮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印尼语、英语、华语、巽达语)，多年来从事翻译工作，并以华文与印尼文创作双语作品，出版了多本文集，有中文版《我没见过中国月亮》、《千岛中华儿女》。印尼文版《Salju Dan Njani Bunga Mei》(咏梅、毛泽东诗词)、《Senja Di Nus-

antara》(千岛暮色)、《Silang Cahaya Kearifan Budaya》(文化智慧 交相辉映)、《Tilai Bambu》(竹帘)、《Puisi Klasik Tiongkok》(中国古典诗歌)、《Kumpulan Puisi Baru Tiongkok》(现代中国新诗集)等。

卜汝亮在印华文坛出道较早，早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就常以“心跃”等笔名在《印度尼西亚日报》上发表作品。并于2000年后，成为“印华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协)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曾任两届该会副主席。后与文坛元老林万里资深作家，在万隆创立了“印华文学社”，曾在国际日报上开辟《绿岛》周刊，卜汝亮为周刊主编。

卜汝亮长期非常重视与主流文化界的沟通，为印中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人文交往工作，他广泛接触主流文化界作家，经常推荐印华作家作品给主流人士。还身体力行，积极从事印中双语创作，其印尼文著作受到主流文化界的重视，经常给予在主流媒体里发表，为印华文友融入主流文化界，摸索出了一条值得文友效法的

探索之路。

卜汝亮对印华文坛持有开放态度，有许多值得点赞的前瞻思维。他认为：印华文坛不论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文学团体，都应摆脱“门户之见”，不宜狭隘区别西区或东区，彼此都是为弘扬华族传统文化的文学组织，理应相互支持，各地报馆刊物(雅加达、棉兰、泗水、坤甸)都应宽容接纳不同地区的作品，对本土文友的优秀作品给予推荐转载，如此方能彰显“印华文友一家亲”的大家庭氛围，摒弃狭隘的“文人相轻”、“嫉妒良才”、“排挤贤能”的刻板思维，彼此包容提携，方为至关重要的上上之策。

在融入主流文化界的问题上，卜汝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探索了一条值得印华文友借鉴的思路，他经常在万隆与主流媒体沟通，参加主流文化界举办的文学讲座会。由于卜汝亮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使得他在与主流文化界沟通时，游刃有余，结交了众多的主流文化界知名人士。所以陈正祥老前辈称赞他是“民间大使”，是名副

其实、当之无愧的客观赞誉。

长期来，印华文学作品没有被主流文化界认同，不被接受是印度尼西亚文学的组成部分，实是一种历史遗留的种族偏见。其实目前华族的身份地位，已经是堂堂正正的印尼公民，与爪哇人、米南加保人、马来由人、峇厘人等，都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字”班查西拉国策的大家庭范围里，其他用族群文字书写的文学能被承认，为何唯独用华文书写的文学不被认可呢？实是可悲而又有失公允的狭隘偏见。

但这种偏见，实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人们知道，荷兰殖民统治印尼三百多年，长期对印尼各族群施行了一整套分化种族关系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把族群分为各等级，华人被列为最低等，华族文化更是受到全方位挤压，华族被孤立为特殊的群体，华人也因此在生活习惯上，与原著民格格不入，被人为地隔绝起来。而且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排华事件，更是使得华人群体在多种治安因素的限制下，为身家安全考

量，更是选择在华人聚居地居住，这就更使得印尼华人自我孤立起来了。

这种华人自我孤立的现状，除爪哇岛外，几乎在印尼各省区普遍存在着，造成许多老一辈的外岛华人不会讲印尼话。这就是为何一部分印尼华人，总是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原因，恐怕还是任重道远，难以在短时间里轻易兑现。但也无需妄自菲薄，暂时不被认可接受，不等于印华文学就被抹杀，印华文学的生命力，早已在历史长河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始终在千岛大地上，展

现出一股永不熄灭的文学火种，永远闪烁着印华文学的辉煌光芒。

在这方面，双语作家卜汝亮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本身也被万隆主流文化界，承认并接受为“真正的印尼人”，他的双语著作，经常被他们作为研讨的文学题材作品，经常邀请卜汝亮参加主流文化界的讲座会，并被恭请成为主旨发言人，这对卜汝亮与印华文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印华文学崇高殊荣。

卜汝亮——这位印华文坛的老大哥，一位出色的“民间大使”，我们应伸出大拇指点赞！祝愿他再接再厉，致力于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来，有计划、有组织地从事翻译印华优秀作品的工作，广向主流媒体推荐介绍。深信有朝一日，当印华文学经过广为翻译成印尼文后，最终定能成为赤道线上的主人公，与公正的主流文学家一起，为印度尼西亚祖国，用华族文化优美的文学触笔，共同谱写——高唱千岛之邦殊途同归(Bhinneka Tunggal Ika)的亮丽凯歌！

中国撞开西方包围的“第三板斧”

廖省：林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9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总统出席。元首们回顾历史，总结合作经验，展望未来，着眼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国际日报》于20日刊登国际锐评《什么是中国与中亚“手拉手前进”的动力》说：“过去30多年，中国和中亚国家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如今，六国元首齐聚西安，共谋未来发展，共同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必将创造更加令人期待的下一个‘黄金30年’。”

评论认为，此次峰会擘画了未来中国—中亚关系蓝图，达成的丰硕成果让世界看到中国同中亚国家未来合作的前景，感受到双方携手为世界繁荣稳定注入的能量。各方宣布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到西安采访的《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表示峰会具有划时代意义，谈到此次签署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他说：“这份宣言为中亚国家与中国继续发展友好关系擘画了蓝图”。俄罗斯的研究员安德烈·格罗津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同中亚国家的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此次峰

会释放出中国进一步发展同中亚国家对话与合作的信号，“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将极大促进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31年来，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成果丰硕的合作项目联通彼此，持续造福地区人民。多国人士认为，此次峰会为未来双方开展互利合作开辟了光明前景。《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强调，各方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新起点，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五国倡议和发展战略对接。

埃及专家艾哈迈德·赛义德说，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主席多次访问中亚国家，推动双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亚国家将迎来全新机遇。乌兹别克斯坦专家沙夫卡特·阿林别科夫说，“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符合地区各方利益。此次峰会将为中亚国家与中国深化拓展各领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认真研究《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合作计划后，哈萨克斯坦研究员叶尔苏丹·然谢托夫表示，“中亚国家与中国计划在覆盖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说明双方合作拥有广阔前景，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道出了中亚五国民众的心声。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埃迪尔·奥斯蒙别托夫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国家尤为

重要。中亚国家同中国的合作有效提升了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中亚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期待此次峰会后，双方达成的合作项目开花结果，进一步促进彼此互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繁荣。”

俄罗斯高级研究员斯坦尼斯拉夫·普里特钦看好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前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亚国家贸易创造便利条件，为中亚国家联通世界建立贸易走廊。”此次峰会让我更加期待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将产生的“乘数效应”，这将为更广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动力。”

《哈萨克商业报》全文转载习主席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内容。哈萨克国际通讯社称，此次峰会是中亚五国与中国多边外交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为中亚和中国之间对话、合作和深化关系提供平台。尽显中亚五国对北京的信心。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西安不仅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连接亚非欧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领导人在热烈的气氛和相互理解中，全面总结了中亚国家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成果，总结多方面互利合作的经验，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塔吉克斯坦《霍瓦尔》国家通讯社详细报道此次峰会，指出《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为解

决区域问题和地区合作指明了方向。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称，此次中国—中亚峰会将对深化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和人文合作至关重要。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报道，本次峰会达成了一系列乌中在工业、贸易的合作，新的投资项目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和合作不断深化，让乌兹别克斯坦信心大增。

本周，两场峰会分别在中国和日本举行，但对比鲜明。西安打造合作共赢的国际典范，而广岛的G7峰会，则继续渲染别国威胁，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发出一张对比图，显示两个峰会的理念与东道国反应的不同。

之前，华春莹在推特发文质问日本：“鉴于1945年对广岛的毁灭性轰炸和1985年《广场协议》的严重影响，日本难道不应该比其他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以及经济胁迫的危害吗？”让美日及其团伙无言以对，并得到网民大量点赞！

评论认为，面对美西方的包围，中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是撕开包围的第一斧！接着第二斧是斡旋阿拉伯与伊朗的和解，而首届中国—中亚峰会该是“第三斧”了。



素质

雅加达：张逸

我不懂音乐，但我喜欢唱歌。很多旋律优美的歌是我的最爱，也常常在家里或KTV展喉高唱。

不久前结识了一个略懂音乐的朋友，他除了会玩几种乐器之外，闲暇之时也尝试谱曲。羡慕之余想跟他学某种乐器，但可能天资迟钝，怎么努力都学不会，只好在旁听他弹曲，听他说说音乐的事宜。

他说，写一首好的歌是不容易的，就像写文章一样，要先知道你想写什么？才用音符的跃动和规律谱写出歌曲的内涵，不是一味追求优美的旋律就可以的。时下很多流行的、旋律优美的歌曲，很受普通百姓喜爱，但歌曲的内涵就差多了。

“一首好的歌曲，不一定会受大众的喜爱，因为欣赏歌曲也是有级别的，欣赏好的歌曲是需要有好的音乐素质，这样才能听出歌曲的内涵，才能与创作者共鸣。”

“那我是没有素质的人了？”我问。

“也不是，”他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素质，有的人有文学素质，有的是科技素质、商业素质……等等，文学素质的人不一定懂得科技，懂得科技的人不一定了解商业。”

“那我是属于哪方面的素质？”我问。

他看了我好久，摸了摸我的头慢慢地说：“你啊，是属于‘傻’的素质。”

“哇，哇，”我大叫了一声，说：“我明天就去买老鼠药，死了算了。”

“别，”他笑着说：“傻有什么不好？傻人有傻福啊！傻人不计较得失，不与人争斗，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有什么不好？你不见有许多聪明的人最后也落个凄惨的下场？”

自那以后，我发觉很少有我喜欢的歌曲了，去唱歌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我想唱的歌。

糟糕，是不是我变得聪明了？

中国—中亚峰会

老顽童

丝路起城峰会开，五国元首应约来。良宵痛饮长安酒，斯坦暖承华夏怀。历史繁花今又盛，百年屈辱不成声。核心强亚政军贸，捍卫主权共太平。



传统画作中华军队进攻东印度公司

被遗忘的重大事件

这一历史故事点燃了整个爪哇的战火，卢克·纳特高(Luc Nagtegaal)把它称作荷兰东印度公司存续生涯中遇到的最激烈的战争。东印度公司从未遇到过战斗范围比这还广的战争。战斗人员的数量也是空前巨大，超过了东印度公司遇到的所有反抗行动。还有一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实质上对爪哇王国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威廉·连默林克(Willem Remmelink)(1996)称这一事件是“爪哇王朝的衰落”，之后诞生了各个

邦(Praja Mangkunegaran)。

虽然这一事件在印尼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事实上现在的民众对它却不甚了解。在学校的历史课程中，这一事件甚至几乎不曾出现过。与此相反，华人抗争却在爪哇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直到现在，爪哇的母亲们经常吟唱诗歌《黑色蚂蚁》(Semut Ireng)作为哄小孩入睡的摇篮曲。这一著名的诗歌以《糖蒸锅》(dandang gula)旋律为伴奏，被口述相传一代接一代。完整的诗歌内

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 (2)

达拉查迪(DARADJADI)

容如下：

“Semut ireng anak-anak sapi, kebo bongkang nyabrang kali Bengawan, keyong gondang branyak sungute, timun wuku godong wolu, Surabaya geger kepati, gegere wong ngoyak macan den wadhahi bumbung, alun-alun Kartasura, gajah meta cinancang ing wit sidogori, matine cineker ayam.” (爪哇原文)

大意是：黑色的蚂蚁有一头小牛，躺着的水牛穿过一条大河，蜗牛带着锋利的触须，有八片叶子的黄瓜，泗水发生了骚乱，被追赶的老虎被扔进了竹筒里，在卡尔塔苏拉广场上发怒的巨象是因为某些并不强大的力量，即是喻指马都拉军队。

还有很多能吟唱上面这首诗歌，但诗歌背后的故事就鲜有人知。同样，虽然卡尔

(Kerbau Bongkang)意思是水牛在倒退；这是暗喻巴古布沃诺二世从卡尔塔苏拉王宫败退并且横渡梭罗河。锋利的触须比作同时在移动的长矛。爪哇历法中第八个星期在泗水发生了骚乱，骚乱中老虎(Macan)被赶进了竹筒(Bumbung)里(Macan, Pibulung和Bumbung类似，都是经常在《华人史》中被提及的华人将领的名字)。大象在卡尔塔苏拉广场横冲直撞是比喻苏南·库宁，他生命的终结因为被鸡(比喻马都拉)抓伤了。在此之前被绑在了西多里树上。西多里树并非高大的树，意思是苏南·库宁被捕并且结束统治是因为某些并不强大的力量，即是喻指马都拉军队。

还有很多能吟唱上面这首诗歌，但诗歌背后的故事就鲜有人知。同样，虽然卡尔

塔苏拉王宫的旧城墙直到现在仍岿然不动，但很多人不了解它的相关历史。这座建筑曾经是爪哇王国衰落的象征，这历史意义已经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消失。梭罗民众每年在2月17日庆祝的梭罗城建城纪念日，实际上是缘于华人抗争。

爪哇人与华人相互来往

传统的爪哇民众认为华族是比他们更古老的民族。在爪哇语中，华族的“先生”(Abu)比爪哇族更古老。在某些方面，华人被认为比爪哇人掌握更高级的知识，他们还会(向爪哇人)传授造纸、制砖、制陶等方法和技艺。在华人抗争发生之前，他们和土著杂居在一起，但是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这种融合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在发生华人抗争之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强制驱赶与土著杂居的华人。这种行径发生在中爪哇

朱瓦纳地区(Wilayah Juana)的德列西村(Desa Dresi)。

除了居住地点，两族之间的融合也体现在互通婚上，特别是华族男性与爪哇女性通婚。与之相反爪哇男性与华族女性的通婚的情况只出现在王室的上层阶级。在爪哇贵族阶级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kena rabi nyonyah, ora kena rabi babah”，意思是：爪哇贵族男子可以娶华族女子为妻，爪哇贵族女子不可嫁华族男子为妻。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人们认为贵族有义务保护爪哇文化，而女性则被认为易受到夫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丢失本族的文化底蕴。史书故事，讲述了很多爪哇贵族和华族女性的爱情和婚姻故事。与红溪惨案有关的最著名的故事是阿尔亚·芒古尼伽罗王子(Pangeran Arya Mangkunegara)和华族女子的爱情故事。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